

版权登记图字：01-1998-2249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斯兰建筑 / (美) 霍格 (Hoag, J. D.) 著；杨昌鸣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世界建筑史丛书)

ISBN 7-112-03743-3

I. 伊… II. ①霍… ②杨… III. ①古建筑: 宗教建筑-伊斯兰教-建筑史

②古建筑: 宗教建筑-伊斯兰教-建筑物-简介 IV. TU-0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1113 号

© Copyright 1975 by Electa Editrice, Mila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by Electa Editrice, Milan.

本书经意大利 Electa Editrice 出版公司正式授权本社在中国出版发行中文版  
*Islamic Architecture, History of World Architecture*/John D. Hoag

责任编辑 董苏华 张惠珍

世界建筑史丛书

### 伊斯兰建筑

[美] 约翰·D·霍格 著

杨昌鸣 陈欣欣 凌珀 译

刘壮翀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2 印张：17

1999年9月第一版 199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53.00 元

ISBN 7-112-03743-3

TU·2888 (903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世界建筑史丛书

# 伊斯 兰 建 筑

[美] 约翰·D·霍格 著  
杨昌鸣 陈欣欣 凌 珀 译  
刘壮翀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由著名的伊斯兰艺术专家约翰·D·霍格所作的伊斯兰建筑这一全面的评述,涉及到伊斯兰教影响地区的建筑的各个方面。在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艺术光彩的文脉之中,对西班牙、北非、埃及和从波斯到奥托曼帝国时代的中东以及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印度的建筑进行了考察。

# 目 录

绪 论	5	
第一章 伊斯兰建筑的滥觞	7	
第二章 伍麦叶时期的建筑	9	
伍麦叶时期的世俗建筑	15	
第三章 阿拔斯时期的建筑	20	
第一节 河中府的阿拔斯建筑	24	
第二节 开罗的阿拔斯建筑	27	
第四章 北非的早期伊斯兰建筑	29	
第五章 西班牙的早期伊斯兰建筑	35	
清真寺：941—987年	37	
第六章 北非与西班牙的古典伊斯兰建筑	45	
第一节 穆拉比兑王朝	45	
第二节 阿尔莫哈德王朝	48	
第七章 北非与西班牙的晚期古典伊斯兰建筑	53	
第一节 马林王朝	53	
第二节 西班牙的纳斯尔王朝与艾勒哈卜拉宫	56	
第八章 埃及的古典伊斯兰建筑：法帖梅王朝	65	
第一节 从阿米尔（1101—1131年）到阿迪德统治时期 （1160—1171年）	70	
第二节 法帖梅王朝住宅	72	
第九章 埃及的晚期古典伊斯兰建筑：艾优卜王朝 和麦木鲁克王朝	73	
第一节 艾优卜王朝（1169—1252年）	73	
第二节 伯海里系麦木鲁克王朝（1250—1390年）	77	
第三节 布尔吉系麦木鲁克王朝（1382—1517年）	83	
第四节 艾优卜王朝和麦木鲁克王朝的本土建筑	85	
第十章 波斯的早期伊斯兰建筑：萨曼王朝和加兹尼王朝	88	
第十一章 波斯塞尔柱克的古典伊斯兰建筑	93	
第一节 清真寺	93	
第二节 商队客店	95	
第三节 经学院	96	
第四节 陵墓	97	
第十二章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古典伊斯兰建筑	100	
第十三章 安纳托利亚的古典伊斯兰建筑	107	
第一节 鲁姆塞尔柱克苏丹王国之前的会众清真寺	108	
第二节 塞尔柱克清真寺	110	
第三节 经学院	112	
第四节 “罕”或商队客店	116	
第五节 宫殿	118	
第六节 贝伊利克酋长国的建筑	121	
第十四章 波斯的晚期古典伊斯兰建筑： 伊儿汗王朝和帖木儿王朝	122	
第一节 完者都和阿布·赛义德的建筑作品	123	
第二节 帖木儿王朝的建筑作品（约1370—1405年）	127	
第三节 沙鲁赫统治时期的建筑作品（1405—1447年）	130	
第四节 晚期帖木儿王朝建筑	136	
第十五章 印度古典伊斯兰建筑	138	
第一节 顾特卜丁和德里的“奴隶之王”（1193—1290年）	139	
第二节 德里的哈利吉王朝（1290—1320年）	142	
第三节 德里的图赫卢格王朝（1320—1414年）	143	
第四节 古尔伯加的巴赫曼苏丹王国（1347—1527年）	144	
第五节 江布尔的沙尔齐苏丹王国（1394—1479年）	145	
第六节 古杰拉特的苏丹王国（1391—1583年）	145	
第七节 洛底王朝（1451—1526年）和苏里王朝 （1540—1555年）	148	

---

第十六章 奥托曼帝国建筑	150
第一节 早期奥托曼帝国	150
第二节 锡南之前的帝国建筑	153
第三节 锡南的作品	158
第四节 锡南之后的皇家清真寺	160
第五节 宫殿和“基奥索克”	161
第十七章 萨法威帝国建筑	164
第一节 沙阿·阿拔斯一世的建筑	164
第二节 伊斯法罕的清真寺	168
第三节 晚期萨法威建筑	170
第十八章 莫卧儿帝国建筑	172
第一节 在巴布尔和胡马雍统治之下的建筑	172
第二节 阿克巴统治时期	174
第三节 贾汉杰尔统治时期	177
第四节 沙阿·杰汉统治时期	178
术语汇编	185
参考文献	187
英汉名词对照	189
照片来源	201
译后记	203

---

# 绪 论

如果我们给伊斯兰建筑下个定义，认为它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们在公元第7世纪至第18、19世纪（在有些地方甚至更晚些）之间，在先知所创宗教（它有着各种名称诸如伊斯兰教、穆斯林教、穆罕默德教等）流行的地方所建造的建筑物，我们就会发现一种异乎寻常的多样性。所用材料不尽相同，从石头、砖或土坯直至木材，建筑技术也是多种多样，从坚硬的方石到在像混凝土一样的芯板上镶嵌面板的各种形式的砖石建筑，从坚硬的砖块到镶嵌在土坯、砖坯或夯实土（teree pissee）芯板上的面砖等。初看之下的这些设计，似乎是在一千二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有多少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就遵循多少种形式。但是，分析了这些看来多种多样的因素之后，我们察觉出其中有值得注意的某些统一原则。

这些原则的第一条，可以解释为古代建筑原则的遗存，在这里以远较西方建筑原则的遗存更为基本的方式流传下来，至少在加罗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之后是这样。直到11世纪为止，似乎还从两个主要区域将古代的形式（包括平面和建筑技术）引入伊斯兰建筑之中。其中的第一个区域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在安条克（Antioch）附近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西南部；叙利亚北部，包括大马士革和鲁萨费（Rusafa）周围地区；巴勒斯坦，集中于耶路撒冷周围地区，以及现在约旦的安曼（Amman）[希腊语称为菲拉德尔斐亚（Philadelphia）]和杰拉什（Gerasa）的一部分。这一区域通过埃及再往南推移——至少在大埃尔穆波利斯（Hermopolis Magna）的北部——同时也更向西推移到北非，包括利比亚海岸和突尼斯的大部分，特别是凯鲁万（Kairouan）地区。在马格里布（Maghrib）地区还遗存着一些古老的聚居中心，诸如：萨穆加迪（Thamugadi）[现在叫提姆加德（Timgad），在阿尔及利亚]和沃吕比利斯（Volubilis，在北非）等，它们可能对早期的伊斯兰建设者产生过影响，但遗失的东西太多，这一点还颇为不能肯定；不过，西班牙的维哥特（Visigothic）建筑，虽然有些粗糙，看来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由于这一区域完全处于罗马和后来的拜占庭的控制之下，在大多数情形，都有足够的财力将那些石匠、镶嵌工和其他手工艺人保留下来，使之继续为新的伊斯兰统治者服务。

伊斯兰建筑早期理念大部分来自第二个区域，即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也就是古代的两河（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流域。在这里以及邻近波斯的地区，尽管希腊和罗马的影响一浪高一浪，但至少从新巴比伦（Neo-Babylonians）时代开始，还是保存下来了不少传统技术和形式。穆斯林通过被其征服的萨珊（Sassanian）王朝继承了

这些技术和形式，它们仍保持着与罗马和它的拜占庭继任者毫不相干或者是互相抵触的特征。我们还可以设想将这项关于伊斯兰建筑起源的探索更向东扩展到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但波斯的理念借助于萨珊王朝和他们的前任的传播，在这一区域早已深入人心，以致早期的伊斯兰建设者没发现多少别的思想足以鼓舞他们（晚期的印度—伊斯兰建筑毋需在此讨论，因其出现于11世纪以后）。

这两个区域中引进或遗存的典型实例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陆续引证。在这里只需对其发展过程稍作概括。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天国花园（paradise garden），这是一片水浇地，由交叉的高架道路分成四个相等的部分，常常与呈辐射对称的水池相连，这些水池也抬高在种植区之上。大约是公元950年以后，在西班牙科尔多瓦哈里发王国（Cordoban Caliphate）时期的麦地那·宰赫拉（Medina al-Zhara）宫殿建筑群里，就布置有这样的两座花园，但其平面资料尚未公开发表。尽管在具体布置时比较自由，这些花园的几乎所有要素，都可以在古罗马时代的庞培古城，尤其是在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花园里找到。赫库兰尼姆的所谓竞技场（如果它确实是的话），有一个抬高了的十字形水池，在十字形的四臂的尽端均有横向的水池。但是，由于这些实例都已在公元79年的地震中毁坏，我们只好在别的地方寻找伊斯兰改型所本的直接原型。这些原型不难在沃吕比利斯的花园中找到，这些花园曾被8世纪时非斯（Fez）的缔造者占据过一段时间。可是，似乎更有可能是大马士革附近或巴勒斯坦沿岸那些晚期古迹或拜占庭式的小别墅为伍麦叶人提供了范本。而伍麦叶人又转过来将这些影响带往西班牙。“查哈·巴格”（chahr bagh）或四等分花园即天国的象征这种看法，已被普遍认为是波斯的，而且是萨珊宫廷花园的旁支，尽管迄今为止尚未找到萨珊的实例。但是，即使是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花园，也必须记住，在安条克和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的希腊统治者是将他们的宫殿与天国等同看待的，这种观念也非常明确地传递给了罗马人，他们将坐落在帕拉蒂诺山（Palatine）的多米坦宫（Domitian's Palace）中环绕在餐桌三面的躺椅指定为朱庇特的座椅（Seat of Jove）。后来这种花园在伊斯兰世界中广泛扩散，他们与天国花园一直有关系，甚至在诸如德里（Delhi）的胡马雍墓（Humayun's）和阿格拉（Agra）的泰姬·玛哈尔陵（Taj Mahal）之类的陵墓上也有所应用，因而可以将其看成是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的形式和意义的遗存，而这种延续性在西欧建筑的任何方面都是难以见到的。

证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形式在伊斯兰建筑中的遗存则有些困难。会众清真寺的多柱式建筑使我们想起，其礼拜殿也许延续着阿契

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的波斯“阿帕达纳”（apadana）<sup>①</sup>的传统，它本身也是赫梯人（Hittite）和稍晚些的乌拉尔图（Urartian）集会大厅的遗存。但是，这些清真寺虽然建造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地区的库法（Kufa）和瓦西特（Wasit），却可能要更多地归功于罗马人将希腊的市场（agora）改造为带有柱廊的巴西利卡的做法，例如在昔兰尼（Cyrene）的凯撒里亚遗迹（Caesareum）或在罗马的晚期图拉真广场（Forum of Trajan）的一部分。当然早期伊斯兰清真寺的功能就像是集会场所、学校、商业中心和法庭，也更像是一种更多遵循西方而不是东方范例的祈祷场所。

如果说会众清真寺是由若干原型混合的产物，则一种与美索不达米亚、至少也是与亚述（Assyrians）一样古老的技术，必定有着全然是伊斯兰建筑的未来。它就是用釉面砖或瓷片镶嵌在墙壁上构成覆盖整个或局部表面图案的方法。以动物和鬼怪为装饰的巴比伦的“伊什塔尔门”（Ishtar Gate）<sup>②</sup>以及来自尼布甲尼萨（Nebuchadanezzar）觐见室的巨大的装饰面板，都是值得注意的例子，这二者现在收藏在东柏林的国家博物馆。要么是这种技术湮没了一段时间，要么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这种装饰的例子来填补空白，因为自从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之后它就消失了[除了从加兹尼（Ghazna）保存下来一些估计是10世纪的釉面砖之外]，直到它的遗存发现于12世纪波斯的迈拉盖（Maragha）为止。从那时开始，彩色贴面装饰逐渐成为伊斯兰建筑设计中的一个主要元素，这种技术甚至还应用于砖石建筑，尽管在这类场合它往往只局限于室内装饰。然而，在保存有用砖、土坯或夯土（各种美索不达米亚技术）建造的建筑物的所有国家，釉面装饰都很流行：从印度到大西洋沿岸，可以提及的这类杰作很多，诸如伊斯法罕（Isfahan）的伊萨清真寺（Masjid-i-Shah）、拉合尔（Lahore）的瓦齐尔汗（Wazir Khan）清真寺，以及众多的摩洛哥和西班牙14世纪或稍晚些的古迹上繁复的“泽里积”（Zellij）或曰马赛克饰面等等。

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在形式上或者说在意义上都很古老的设计要素，遗存在伊斯兰建筑中的远较在西欧建筑中的为多。这就为我们理解伊斯兰建筑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也要求我们设想出一种研究途径，可以将这一庞大的题目用某种意义丰富的方式明确表达出来。尽管很难说是独创的作法，但把用于新世界高文化研究的某些术语用在伊斯兰建筑上似乎也是有用的。第一个术语就是“前古典”（Pre-Classical）或“形成期”（Formative），相当于奥列格·格拉巴尔（Oleg Grabar）在其最近的著作《伊斯兰建筑的形成》中对早期伊斯兰建筑的界定，这将包括伍麦叶哈里发（Umayyad Caliph）王国以及它的阿拔斯（Abbasid）继任者直至公元1100年的建筑。在北非和埃及，从阿格拉布王朝（Agh-

labids）和早期的法帖梅王朝（Fatimids）开始直到大约公元1085年的建筑都可以归入这一类。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哈里发王国以及它的泰法斯（Taifas）继任者起直到1086年穆拉比兑（Almoravid）的征服为止的建筑也是如此。在波斯或更东部地区，“形成期”将包括萨曼王朝（Samanid）和加兹尼王朝（Ghaznavids）的建筑，直到11世纪后四分之一时期塞尔柱克（Seljuk）建筑的成熟为止。这一时期以积极而迅速地利用前伊斯兰教时期的形式和技术为特征。尽管在他们所创建的主要建筑物上仍然部分地保留着外来主题的痕迹，但似乎从未被消化和吸收。例如，一座单体建筑的拱券，在不破坏一致性的前提下，可以从半圆形拱或略呈马蹄形的拱向尖拱变化。在整个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逐渐增长的、要求更直接地共享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理念的趋势。

古典（Classic）及晚期古典（Late-Classical）伊斯兰建筑大致与“穆克纳斯”（Muqarnas）（钟乳形或蜂巢状的拱顶）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传播的步调一致。这一现象将在别处讨论，这里只提下述事实就够了，虽然它大约是发明于“前古典”时期的波斯，但其迅速传播则近于11世纪末期，同时还伴随着尖拱的广泛运用——或者是西班牙和北非的马蹄形拱或者是其他的简单形式。“古典”阶段的崛起，则与穆拉比兑在北非及西班牙、稍后的法帖梅人在埃及，以及赞吉（Zengids）王朝和后来的艾优卜人（Ayyubid）在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相一致。在波斯，塞尔柱克人完善了古典形式。他们在安纳托利亚的亲戚通过拜占庭的征服将其带到了那里。阿富汗的古里人（Ghurids）又将古典的塞尔柱克形式带到了印度，但那个国家的特殊条件又赋予了它在形式上的某些改变。

尽管有教派和王朝的争端，在古典和晚期古典时期，技术和形态方面的思想仍自由自在地在整个伊斯兰区域内四处传播。当马赛克装饰技术以及后来的彩绘面砖传遍伊斯兰世界的时候，叙利亚的石头镶嵌技术却在埃及和安纳托利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装饰主题在材料上的反复转换相当频繁——例如，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克人从波斯引进的、作为石头装饰手段的抹灰雕刻形式，或者是摩洛哥人在抹灰和木雕之间的互换。在印度，石头装饰的灵感则不仅来源于灰塑和砖雕，而且来源于印度教的木构建筑。

晚期古典伊斯兰建筑沿用着古典时期的形式及其变换不定的理念。然而，从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开始，相对于装饰表面或是整个结构的尺寸而言，各地都在装饰尺度上有所缩减。这一点在格拉纳达（Granada）的

<sup>①</sup> apadana，“阿帕达纳”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皇宫内的大殿。——译者注

<sup>②</sup> Ishtar Gate：“伊什塔尔门”，即女神之门。——译者注

# 第一章 伊斯兰建筑的滥觞

纳斯尔王朝 (Nasrids) 以及与之同时代的北非马林人 (Marinid) 的建筑上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埃及和叙利亚的麦木鲁克王朝 (Mamluks)，以大体上相同的方式来对待从他们的前任艾优卜王朝那里继承下来的形式。在波斯，自从蒙古入侵伊尔汗王朝 (Ilkhanids) 之后，在不改变其基本形式的情况下再度缩减了塞尔柱克装饰的尺度。非常明显，在其继任者帖木儿王朝 (Timurid) 的庞大建筑中，采用了小尺度的砖瓦灰塑甚至大理石的优美装饰。从哈利吉王朝 (Khalji) 到洛底王朝 (Lodis) (直到 1526 年为止) 的印度石构建筑也呈现出类似的发展过程。

美国研究原始居民语言、文化的专家所说的“后古典” (Post-Classical) 时期，如果不包括国家的兴起，至少涉及军事霸权的兴起，有时是大范围的。在这些军事实体之间，似乎没有多少观念上的沟通。连同伊斯兰教一起，这个术语在这里的使用将与伊斯兰建筑发展过程中最后一批伟大的革新家有关。他们是 1453 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奥斯曼 (Ottoman) 帝国、大约 1550 年之后波斯的萨法威 (Safavid) 王朝、胡马雍 (Humayun) 大帝于 1555 年回国之后的莫卧儿 (Moghul) 印度帝国。有别于先前的所有伊斯兰政权，这三个王朝各自都培养着某种自我意识，这是一种民族的自我意识，类似于与其说是在文化上不如说是在中世纪的同一片土地上所诞生的、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欧洲各民族的同期进展。这三个王朝各自都在为清真寺、住宅和陵墓的古老问题设计出高度创新的解决办法的同时，采用了适合于自己的建筑形式、装饰和地方材料，并使之形成一种惟一而又非常独特的模式。这三个王朝虽然全都因教派的不同而受到分隔，却享有相邻的边界。然而，这种地理上的邻近并未导致实际上的跨文化交流。设计理念和匠人只在各王朝的省份之间流动，从未向境外输出过。有可能会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莫卧儿印度确实会给人以汲取过萨法威波斯灵感的感觉，但进一步考察，对于其艺术上的明显相似性，就很容易用印度和波斯都继承了帖木儿王朝的形式这一事实来加以解释，尽管后来它们各自都很独立地对其进行了改造。

读者也可能问及发生于本书所省略了的那些伊斯兰区域的建筑进展。这将包括突尼斯的哈夫斯德 (Hafsid) 和 1228 年以后的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以及 1511 年以后的摩洛哥。在这些区域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很有意义的建筑创新。对过去形式的不断重复，造成了日益增长的机械的和陈腐的结果，正如在晚期的开罗麦木鲁克王朝一样，直到对欧洲形式的模仿、或者是在土耳其征服者到来之后的奥斯曼仿制品的浪潮，沿着海岸线冲刷掉那些仍然残存着的早期形式为止。现在正在进行的对这些区域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古典建筑的修复工作，甚至是采用较早的形式所进行的新建筑创作，无论胜任与否，都不在本书所涉及的范围之内。

伊本·赛德 (Ibn Sa'd，卒于公元 845 年) 在其关于穆罕默德的传记中叙述了一个故事，第一次讲述这个故事的是阿卜杜拉·伊本·亚兹德 (Abd Allah ibn Yazd)，他曾于 707 年访问过麦地那 (Medina)，当时先知的住宅还保持着原状。阿卜杜拉在那里会见了乌姆·萨拉马 (Umm Salama) 的一个孙子，并同他进行了交谈。乌姆·萨拉马是穆罕默德的遗孀之一，她曾对她的孙子说过，当穆罕默德于 626 年随远征军前往杜马 (Duma) 而离开她的时候，她曾用一堵砖墙对其住宅进行了扩建。但穆罕默德回来后即指责她，说：“哦，乌姆·萨拉马，建筑是消耗一个信徒财富的真正最无益处的东西。”这种观点在整个正统的哈里发时期似乎曾在阿拉伯人中十分流行。克雷斯韦尔 (K. A. C. Creswell) 甚至走得更远，他说当时的阿拉比亚 (Arabia) 展现出“一个近乎完美的建筑空间和‘阿拉伯’这一术语将决不会用来称呼伊斯兰建筑”。

当穆罕默德于 632 年逝世后，由四位被推选出的哈里发或虔诚信徒的领袖继任，他们兼有穆罕默德曾经执行过的宗教和世俗的职能。他们是阿布·贝克尔 (Abu Bakr, 632—634 年)、欧麦尔 (Umar, 634—644 年)、奥斯曼 (Uthman, 644—656 年) 和阿里 (Ali, 656—661 年)。他们全都与先知的家庭和他的部族即古莱氏族 (Khuraysh) 有着亲戚关系。他们的名字直到现在仍明显而突出地陈列在大多数清真寺中，在这些人的统治下，也称为正统派哈里发时期，发生了伊斯兰教的第一次伟大的征服。到了欧麦尔统治末期，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被攻陷，整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南岸直至迦太基 (Carthage)，都在“伊斯兰教地区” (Dar al-Islam) 或曰“和平之家” (abode of peace) 之中。到奥斯曼逝世时，对东波斯乃至梅尔夫 (Merv) 的征服已决定了萨珊王朝的命运，虽然它的西部首府泰西封 (Ctesiphon) 已经被欧麦尔 (于 637 年) 抢劫一空。拜占庭王朝，尽管已大为削弱，仍残存下来，其变换不定的边界在此后的七百年中，经常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侵犯，成为“战争之家” (Dar al-harb) 和“和平之家”之间的分界标志。

## 一、会众清真寺及其要素

虽然伊斯兰的头两个朝代的建筑已荡然无存，但是有丰富的文献史料证明，首先是在麦地那本地，然后是在新的聚居 (或军事) 营地诸如巴士拉 (Basra)、库法或弗斯塔德 (al-Fustat)<sup>①</sup> 等地都发生过若干建筑活动，正是这些活动赋予了伊斯兰建筑某些最突出的特征和不朽的

① al-Fustat：“弗斯塔德”，系由拉丁语转译而来，意思是营地。——译者注

图 1 库法, 清真大寺, 638—639 年, 原始平面 (引自克雷尔斯韦尔, 1969 年)

形式。在它们之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会众清真寺 (Congregational Mosque), 有时也叫作聚礼日 (Friday)<sup>①</sup>清真寺。这是一个“马斯吉德” (Masjid) 或曰礼拜场所, 它设置在营地的中央, 其大小足以容纳参加聚礼日礼拜的全部男性信徒。部族组织也会在营地的其他地段划定另外一些较小的“马斯吉德”, 用于日常礼拜活动——但我们对其知之甚少。从 624 年起, 当穆罕默德亲自规定“齐伯拉” (qibla) 或曰“礼拜的方向”必须朝向麦加 (Mecca) 的克尔白 (Kaaba) 之后, 无论其建筑场地和周围道路条件如何, 所有的清真寺都遵循了这种布局模式 (克尔白是前伊斯兰教时期的圣地和朝觐中心, 其原有偶像已按照先知的命令, 在他胜利回归麦加时加以捣毁。先知还规定每个信徒在其一生中必须朝觐麦加至少一次)。

在 628 年, 由于到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住宅庭院中听他宣礼的人实在太多, 因而不得不为他设计了一座有两级台阶或更高些的讲坛。在这个“敏巴” (Minbar) 上, 穆罕默德率领信徒做礼拜、执行审判、颁布新法律, 他的所有继承者也是如此。站在会众清真寺里那升高的讲坛上做聚礼日礼拜, 遂成哈里发和地方统治者的特权, 并由此而演化成政治的和宗教的行为。事实上, 阿达罕 (adhan), 即对礼拜者的召唤, 是由“穆尔怎” (muezzin)<sup>②</sup>用嗓音来完成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 东方基督教使用木制拍板, 而希伯莱人使用羊角号——这就为将光塔 (minaret) 最终引入清真寺的建筑主题铺平了道路, 尽管清真寺本身的屋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担负了这种功能。

在 638—639 年, 赛耳德·伊本·瓦嘎斯 (Sa'd ibn al-Waqqas), 这位库法城的第一个统治者和缔造者, 在这里建造了一座会众清真寺。这座建筑的平面为方形, 每边的长度大约是 340 英尺 (1 英尺 = 0.3048m——译者注)。虽然有过无数次的重修, 现在仍在原地或距其很近的清真大寺的内部实测尺寸是 328 英尺 × 354 英尺, 与原有尺寸非常接近。据说它原来的空间仅仅是由一道壕沟来加以限定的。面朝着“齐伯拉”的方向, 有一座利用废旧大理石柱建造的没有围墙的门廊, 上面覆盖着模仿叙利亚教堂做法的、用桁架支撑的双坡木屋顶。比它早建三年的巴士拉原来的会众清真寺, 则仅仅是用芦苇做的篱笆来围合的。

第一代清真寺虽然十分简朴, 但它们却包含了为无数后来建筑所遵循的形象。它们基本上是直线形的类似祭坛 (forum) 的院落, 朝向麦加的方向, 并且有一座有顶圆柱大厅, 就像希腊的敞廊 (stoa) 或者是更正规些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阿帕达纳”一样。的确, 在伊斯泰赫尔 [Istakhr, 在古代的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 附近], 据说曾有一座

有着公牛柱头的清真寺, 有一根柱子确实幸存下来了。我们不要设想这种空间仅仅只用在宗教上。就像希腊的市场 (agora) 和罗马的广场一样, 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巨大院落也是一个公共集会的场所。它具有法庭和议事厅的功能, 对于后来的建筑史来说, 最重要的还在于它同时也是哈里发或他所指定的统治者被公众欢迎或接纳的场所。

## 二、地方长官公署

在巴士拉清真寺的东北面, 有一座建于 635 年的地方长官公署 (Dar al-Imara), 或总督治所, 它包括一座“迪万·艾姆” (diwan-i-am) 和一座监狱。638—639 年在库法也建造了一座拥有一间公共库房 (bayt al-Mal) 的地方长官公署, 它建于清真寺的“齐伯拉”一侧, 但有一条狭窄的街道将其与清真寺隔开。在发生了盗贼侵入库房的事件之后, 哈里发欧麦尔下令在紧邻着清真寺的“齐伯拉”墙东边不远处重建地方长官公署。这座建筑 (建于 644 年前不久) 是用旧砖建造的, 建筑师是一个波斯人。从 644 年以后到 656 年之前, 穆阿威叶 (Mu'awiyah) 一世, 这位大马士革的统治者及未来的哈里发, 在这座城市贝尔 (Bel) 神庙的伟大圣区 (神圣境域) 的南侧或是“齐伯拉”一侧建造了一座地方长官公署, 后来它被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作为共同的礼拜场所来使用。这座砖砌的建筑, 被称为绿圆顶宫 (Qubbat al-Khadra)<sup>③</sup>, 因此, 正如其名称所反映的那样, 它有着一个穹顶, 可能还覆盖着绿瓦; 地方长官公署与清真寺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穆阿威叶的住宅没有什么建筑学的追求, 而且被一个希腊使者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 “高处为鸟巢, 低处为鼠穴”。即使是有这样的嘲讽, 几乎恰好覆盖着“迪万” (diwan)<sup>④</sup>的穹顶, 暗示着罗马的某些象征以及萨珊王朝的统治, 已经被那些确确实实地继承了对已知世界的一大部分的统治的人们所接受。然而, 当时建造的作品, 即使还有些幸存至今, 也许只能为我们勾勒出建筑所要遵循的模式的大致轮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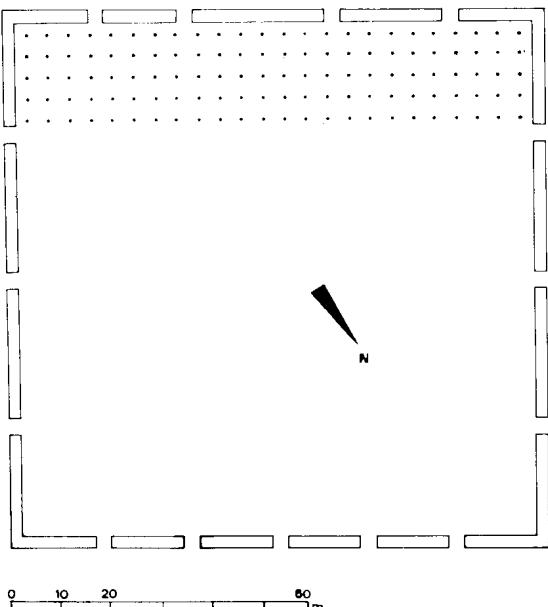
① Friday: “聚礼日”, 先知迁入麦地那的第一天 (公元 622 年 9 月 26 日) 为聚礼日 (主麻日), 这一天为普通星期五, 以后每星期五便成为穆斯林的“聚礼日”, 取代了犹太人的“安息日”。——译者注

② muezzin: “穆尔怎”, 即负责报告礼拜时刻的人。——译者注

③ Qubbat al-Khadra: 音译为“古巴特·哈德拉”, 根据《阿拉伯史》译为绿圆顶宫。——译者注

④ diwan: “迪万”, 大厅之意。——译者注

## 第二章 伍麦叶时期的建筑



穆阿威叶一世，从 641 年起就是大马士革的总督，从未接受过最后一个正统派哈里发阿里（Ali）的管辖，并且在阿里于 661 年被谋杀以后，说服阿里的儿子哈桑（Al-Hasan）放弃了继承王位的权力。于是，伍麦叶哈里发帝国应运而生，其名称来源于穆阿威叶的麦坎（meccan）部族。伊斯兰教地区的扩展虽然仍旧在持续着，但势头已经减小。在 8 世纪的头两个十年里，曾发生过向河中府（Transoxiana）和印度西海岸的信德省（Sind）的东征；在其西面，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于 711 年臣服于伊斯兰教 [然而，自从 723 年在普瓦蒂埃（Poitiers）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西欧就永远留在了“战争之家”]。在经历了 673—678 年和 716—717 年的两次围攻以后，穆斯林试图夺取君士坦丁堡（Constantionople）的努力归于失败，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那样，这也迫使后来的伍麦叶人倾向于对萨珊王朝的标志和符号的运用，对于萨珊王朝来说，他们是无可争辩的继承者。

克雷斯韦尔相信，相对于简陋的房屋来说，建筑艺术是由齐雅德·伊本·阿比西（Ziyadh ibn Abihi）首先引入伊斯兰世界的，他曾效力于阿里，但经过劝诱后又转而效忠于穆阿威叶。他起初担任伊斯泰赫尔的长官，然后又在 665 年被委派至巴士拉担任了平息政治骚乱和派系斗争的职位，他在那里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清真寺发表了一次纯政治的演讲，这次演讲从此成为果断而简洁的典范。

就在同一年里，齐雅德命令重建会众清真寺，采用了砖、石柱和柚木屋顶。他靠着“齐伯拉”墙重建了地方长官公署。他还在礼拜殿里面设置了一个“麦克苏拉”（maqsura），就像一年以前穆阿威叶在大马士革所做的那样。“麦克苏拉”是在“齐伯拉”墙的中心位置用木栅栏围合而成的一个区域。在“麦克苏拉”里有“敏巴”和“米海拉卜”（mihrab），后者是一个壁龛，其惟一的功用就是指示麦加的方向。它是由哈里发韦立德（Caliph al-Walid）于 706 年首先引进的，当时他正在重建曾是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住宅的那座清真寺。他的科普特（Coptic）工匠仿效了一种埃及基督教的模式，这种模式遭到了一些比较保守的穆斯林的批评。齐雅德在巴士拉也授意设置了一座门，以便能够从地方长官公署直接进入“麦克苏拉”。他当时曾说：“此举是为了使伊玛目（Imam）<sup>①</sup>（意即他自己）不必从人群中穿过。”显然，权力的附属物和象征已经开始聚集在伊斯兰早期领袖的周围了。

### 一、库法的清真大寺和地方长官公署

在他任职于巴士拉之后不久，齐雅德又被任命为库法的总督。他于

<sup>①</sup> Imam：“伊玛目”，伊斯兰教国家的元首或教长。——译者注

图 2 库法, 670 年齐雅德·伊本·阿比西重建的清真大寺, 平面  
(引自克雷斯韦尔, 1969 年)

图 3 库法, 地方长官公署, 平面(引自克雷斯韦尔, 1969 年)

图 4 耶路撒冷, 哈拉姆·谢里法, 平面(引自格拉巴尔, 1959 年)

670 年在那里用 51 英尺的石柱和柚木屋顶重建了会众清真寺。其礼拜殿有五个柱列, 这种做法很可能是第一次。沿着其余三面墙分别设置了有柱廊, 围合出“萨罕”(sahn), 即内部的中心庭院。其外墙由半圆形塔状砖扶壁组合而成。负责重建工作的建筑师是波斯人, 他们曾为萨珊人效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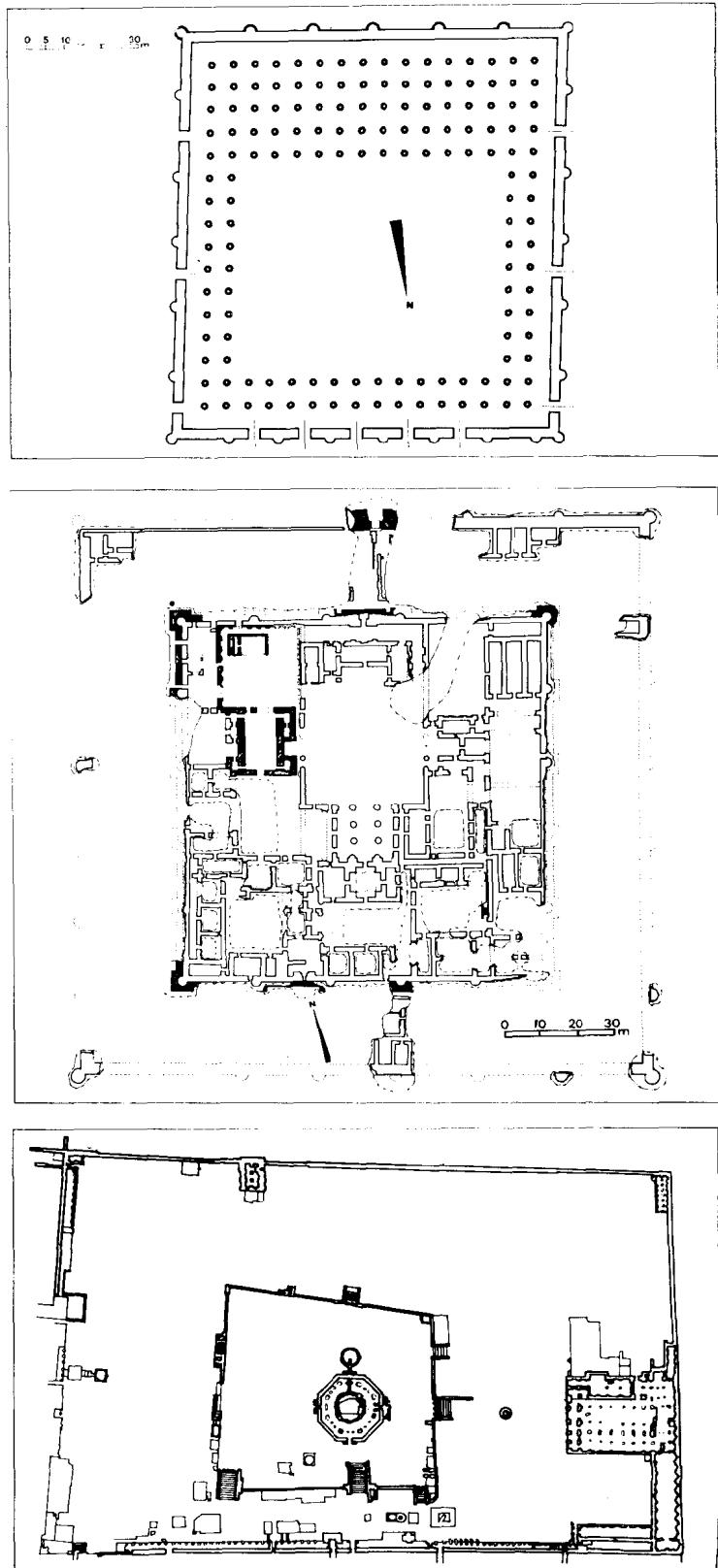
齐雅德在库法还重建了地方长官公署。目前对这座复杂的建筑虽已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 但尚未最后完成, 它至少经历了三个时期, 也仅仅只有它所处的位置, 即清真寺的“齐伯拉”墙东面不远处, 还可以证实它占据着那座始建于 635 年、并于 644 年在赛耳德·伊本·瓦嘎斯领导下重建的建筑的原址。事实上, 对于第二时期的突出的轴线布局以及它那复杂的巴西利卡式的觐见厅(throne hall)来说, 也只有建造于伍麦叶帝国末期的冬宫(Mshatta)<sup>①</sup>或是阿拔斯王朝早期的伍赫伊迪尔宫(Ukhadir)可以与之相媲美。因此, 即使是有着齐雅德的波斯经验、他的政治倾向以及他对富有经验的建筑师的使用, 除了内城或许还有一部分外城的基础之外, 不可能还有多少属于他那个时代的遗迹。

## 二、耶路撒冷的圣石庙

穆阿威叶的儿子哈里发叶齐德(Yazid, 680—683 年), 曾极其艰难地建立起世袭制度来取代选举制度, 却不幸因哈桑(Hasan)的兄弟侯赛因(Husein)在卡尔巴拉(Kerbala)的被谋杀而遭到谴责。此举使得阿里的忠实信徒伊本·祝拜尔(Ibn al-Zubayr)得以占据麦加而僭称哈里发, 直到哈里发阿卜杜勒·马立克(Abd al-Malik, 685—705 年)于 693 年将其击败, 他在麦加的统治方告结束。在 685 年/686 年或 687 年/688 年, 阿卜杜勒·马立克开始建造“古巴特·塞哈拉”(Qubbah al-Sakhrah), 即著名的耶路撒冷的圣石庙(Dome of the Rock in Jerusalem)<sup>②</sup>, 于 692 年完工(根据庙内的记载)。直到今天仍被作为“哈拉姆·谢里法”(Haram al-Sharif)或曰尊贵的圣地来保护的圣石——扮演着一种祭台华盖(ciborium)角色的中心式布局的伟大建筑——与三种主要的信仰都有许多联系。据说先知穆罕默德著名的登霄夜间旅行, 就是在圣石上面或其附近开始进行的。正如其下的洞穴所暗示的那样, 圣石很可能屹立在犹太教寺院焚烧祭品的祭坛下面; 人们历来都认为, 作为莫赖厄山(Mount Moriah)的顶点, 它曾是亚伯拉罕(Abraham)要宰他的儿子伊萨克(Isaac)以作燔祭之处, 而阿拉伯人相信他们是其后裔。

① Mshatta: 《阿拉伯史》译为冬宫。——译者注

② The Dome of the Rock in Jerusalem: 直译为“耶路撒冷岩石上的穹顶”  
根据《外国建筑史》(陈志华著)译为“耶路撒冷的圣石庙”。——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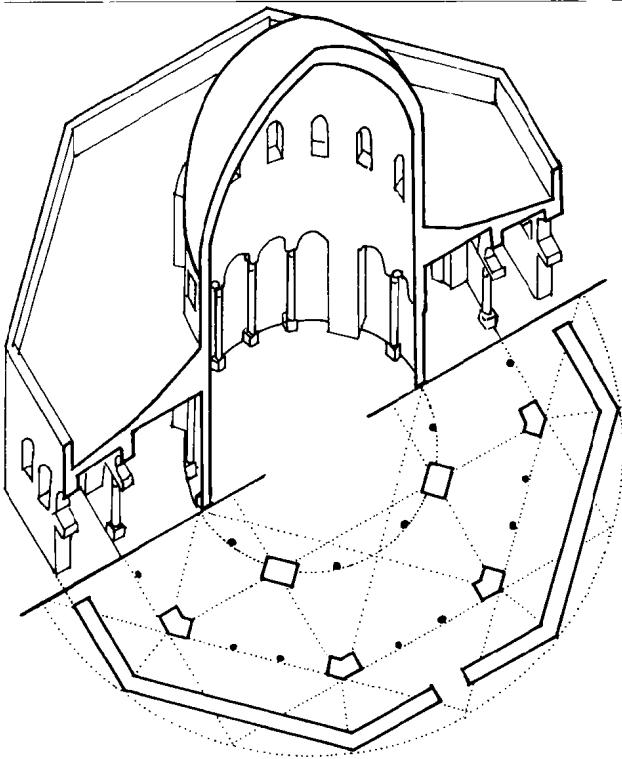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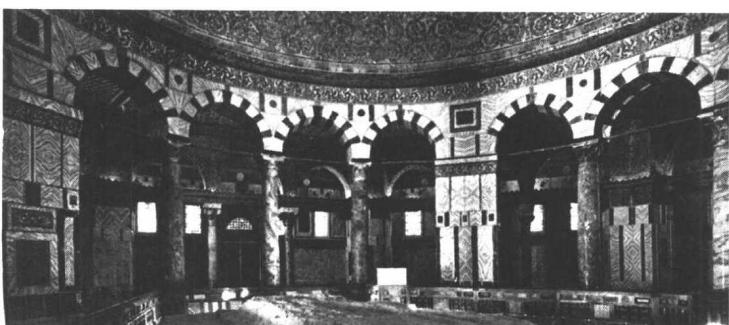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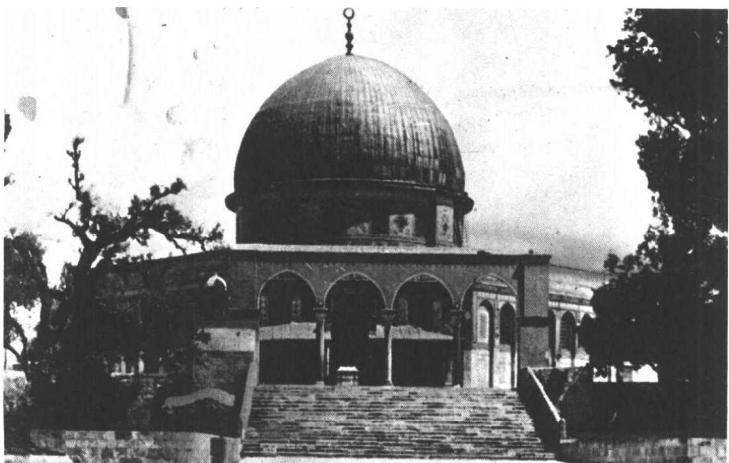
图 5 耶路撒冷, 古巴特·塞哈拉(圣石庙), 685 年/686 年或 687 年 /688—692 年, 轴测剖面

图 6 耶路撒冷, 古巴特·塞哈拉(圣石庙), 自阿格萨清真寺眺望

图 7 耶路撒冷, 古巴特·塞哈拉(圣石庙) 中厅, 前景为圣石

从它拥有内外两道回廊的设计来看, 这座建筑可能曾试图与麦加的克尔白相匹敌, 那里的回廊也是宗教仪式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无论这一目的是否曾在阿卜杜勒·马立克的头脑中占据过上风, 整个设计确实表现出不少很有意义的特征。

八边形的外墙, 用大理石镶嵌至与窗户相等的高度。再往上则是从 1554 年以来新贴的土耳其面砖, 这些部位曾经镶嵌着玻璃马赛克, 在其穹顶的鼓座表面也是如此。这些马赛克装饰的题材, 据我们所知包括树木、花草和建筑。它们很可能也曾被当作是天国的象征, 就像那些仍然保存在大马士革清真寺廊殿 (riwaq) 里的马赛克装饰一样。其内表面用绘画装饰, 而镀金装饰的外表面呈现出微微凸圆的轮廓线的木构穹顶, 曾于 11 世纪初重修, 但基本保持了原样。四座大门, 原先各自都有一个双柱拱顶门廊, 面向四个主要方位并可通往外侧的回廊, 其设计重点放在水平方向, 借助于罗马味很浓的柱头与 24 个拱券及八座扶壁的连接所构成的内部分区来加以强调。在这些拱券的外表面上, 都镌刻着在所有伊斯兰建筑中首次出现的碑铭; 对此我们稍后再作讨论。将内回廊与中央主室屏蔽开来的是支撑穹顶鼓座的 16 个拱券和四座扶壁: 只是由于横梁对光线有所遮挡, 鼓座本身迅速扩展成为穹顶下面的一个高耸的采光空间。



其平面布局以一个正方形在另一个正方形上的  $45^\circ$  旋转为基础。在此而形成的角度很钝的正八角星的八个顶点, 确定在三组结构体系中起支撑穹顶鼓座作用的四座扶壁和四根中柱的位置。在由两个原始正方形的各条边等距离延伸而形成的另一个八角星的顶点, 确定另一道回廊的扶壁的位置, 同时也构成了另一对较大的相互交错的正方形, 环绕着这两个较大的正方形的顶点可以画出一个圆形, 而这座建筑的八边形外墙尺寸也就在这个圆形里得以确定。对于几何形式的如此精细的推敲, 在叙利亚并不鲜见, 与之相似的平面布局, 如像 4 世纪时建于橄榄山 (the Mount of Olives) 的纪念耶稣升天的教堂以及 5 世纪的圣母陵墓 (tomb of the Virgin) 等, 都可作为例证, 至于在阿纳斯塔斯 (Anastasis) 的耶稣陵墓上就更不用说了——在那里, 不但其扶壁和柱子的内切圆尺寸几乎完全相同, 而且同样使用了 12 根柱子与四座 (但在阿纳斯塔斯则是两座) 扶壁的交替。在其室内马赛克装饰及铭文的处理上, 我们也可看出圣石庙的设计隐约与当地著名的基督教圣殿有着特殊的联系。这一设计创造出数不胜数的纷繁复杂的装饰性网格, 伊斯兰艺术成熟地展示于墙面、顶棚、金属制品和纺织品中。

在内部的八边形的内外两个表面的铭文下面、在鼓座外表面的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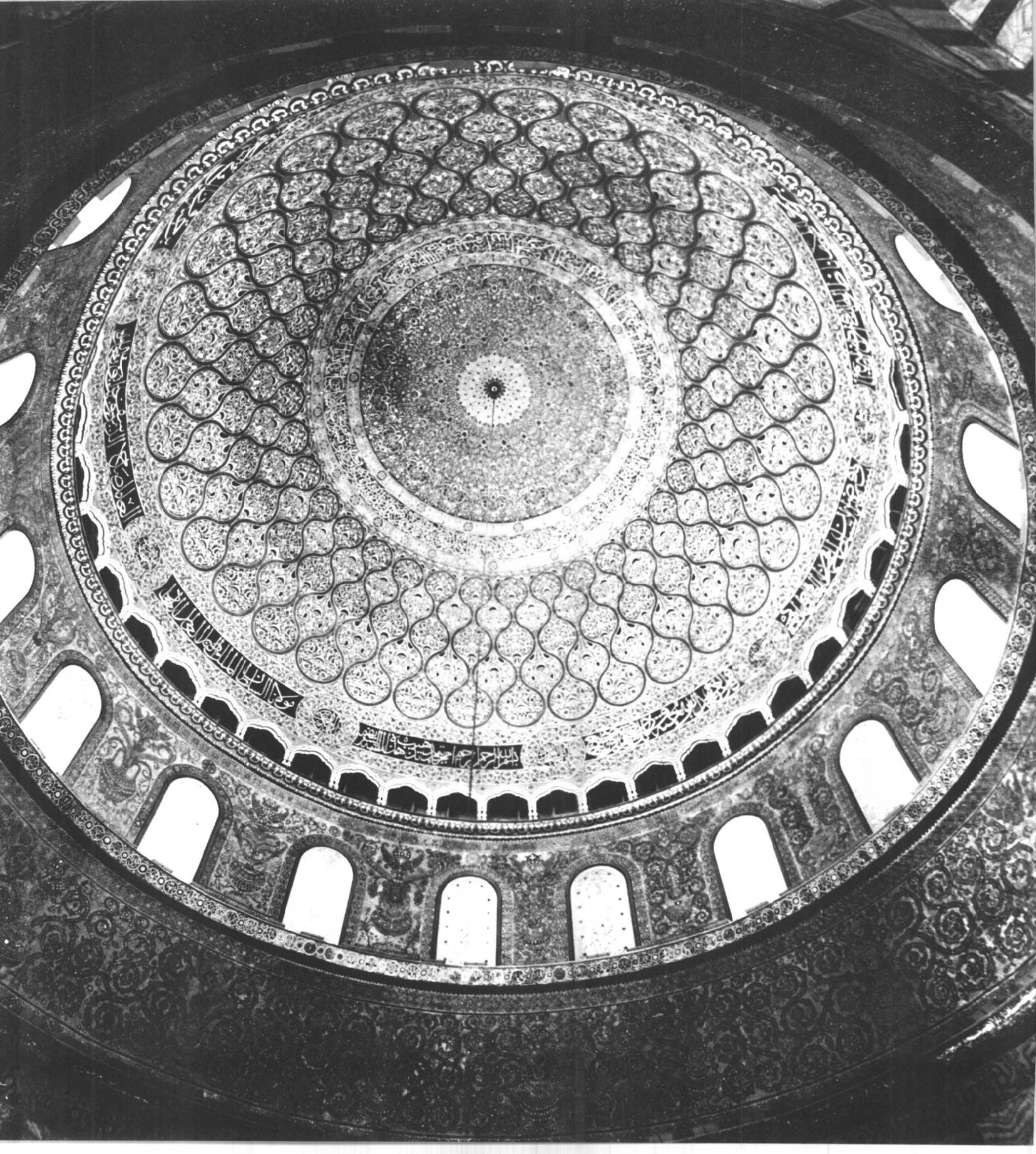


图 8 耶路撒冷, 古巴特·塞哈拉(圣石庙), 表现珠宝的马赛克镶嵌圆屋顶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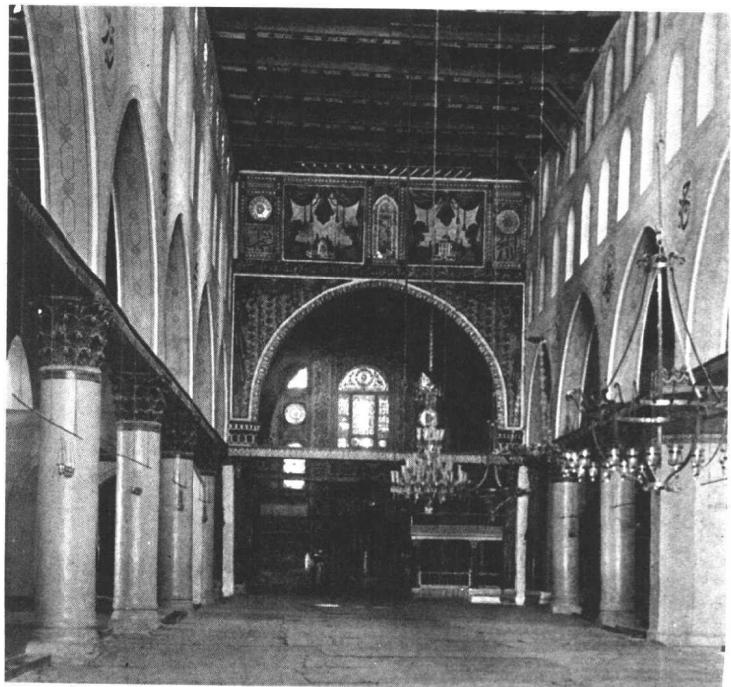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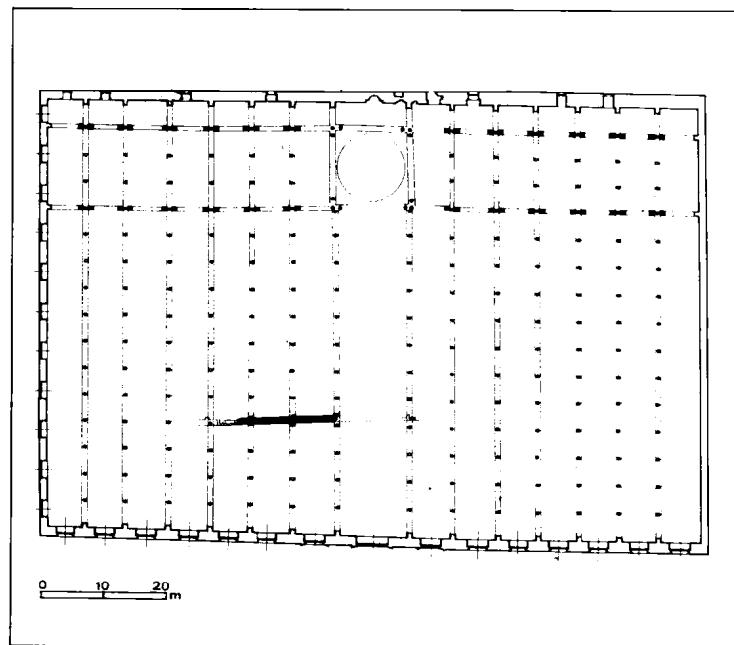
肩上以及从鼓座本身的内表面直到穹顶起拱点处, 都有华丽的马赛克装饰, 它们仍忠实地保存着阿卜杜勒·马立克时期的设计者的意图, 尽管在 11 世纪或更晚些时候曾进行过若干次维修。植物图案层层叠叠地遍布于整个表面, 其形式以完整的树木和从花瓶或藤状灌木丛中蔓延出来的卷草为主。其题材虽然是东方(萨珊)的, 但希腊—罗马的来源却占据着主流位置, 正如它们随后在大马士革的表现那样。然而, 那些在后来的伊斯兰装饰中非常典型的几何形装饰及交错构图, 在这里却全然不见踪影。在八边形的内表面上经常可以看到对宝石(王冠、精致的项圈、项链等)的表现, 这种情况在鼓座的内表面也可见到, 只是不如前者丰富而已。有些王冠与新月或与可使人联想到萨珊王权的翼状图案组合在一起。奥列格·格拉巴尔曾推测这些王冠具有一种功能, 类似于它在基督教文脉体系中的相似表现, 也就是作为敬献给圣殿的还愿王冠。在这里, 它们标志着伊斯兰对波斯帝国的胜利以及对拜占庭和其他基督教势力的预期胜利。格拉巴尔的这一并非没有异议的解释, 似乎可以得到那幅首次出现在伊斯兰建筑中的、大约有 787 英尺长的铭文的支持。铭文上的《古兰经》语录指导着“读书的人们”, 那就是, 犹太教徒、尤其是基督教徒。铭文强调指出, 现在只有伊斯兰教才是真实的信仰, 将穆罕默德和耶稣作为先知来对待, 但否认耶稣的神性。对于穆斯林来说, 这幅铭文及这座建筑本身, 就是一种回应, 因为纯朴的贝杜因人(Bedouin)受基督教及其仪式的吸引而常常感到不安。它们是伊斯兰教优越性在道义上的、而且在这种场合也是具有艺术丰富性方面的胜利宣言。

### 三、阿格萨清真寺

虽然现存的建筑——有很多改变和削减——得益于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多于伍麦叶帝国, 但在这里讨论其全部历史要比以后再回来讨论更合适些。有关哈里发欧麦尔时期的第一座阿格萨清真寺(The Mosque of al-Aqsa)的情况, 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 他曾命令为一处古代废墟加盖了屋顶, 这废墟很可能是沿着寺院区域内所残存的南墙而建的希罗德(Herod)时期的大柱廊。这座建筑看起来只不过是一幢毫无建筑学意图的临时性房屋而已。最近在埃及发现的阿芙洛狄特纸莎草纸文稿(Aphrodito papyri)表明: 阿卜杜勒·马立克的继任者韦立德一世(705—715 年), 曾经在 707 年到 715 年之间从埃及输送出一些工匠, 去为“耶路撒冷的清真寺”和埃米尔·穆仪敏尹(Emir al-Muiminin)<sup>①</sup>的宫殿(地方长官公署)工作, 其遗迹已在最近发现于“哈拉姆·谢里法”的南墙下。关于韦立德在耶路撒冷使用马赛克装饰的情

图 9 耶路撒冷, 阿格萨清真寺, 平面复原(引自克雷斯韦尔, 1969 年)

图 10 耶路撒冷, 阿格萨清真寺, 室内



<sup>①</sup> Emir al-Muiminin: 《阿拉伯史》译为信士们的长官。——译者注

图 11 大马士革, 清真大寺, 韦立德时代的平面 (引自克雷斯韦尔, 1969 年)

图 12 大马士革, 清真大寺, 面向西廊殿的萨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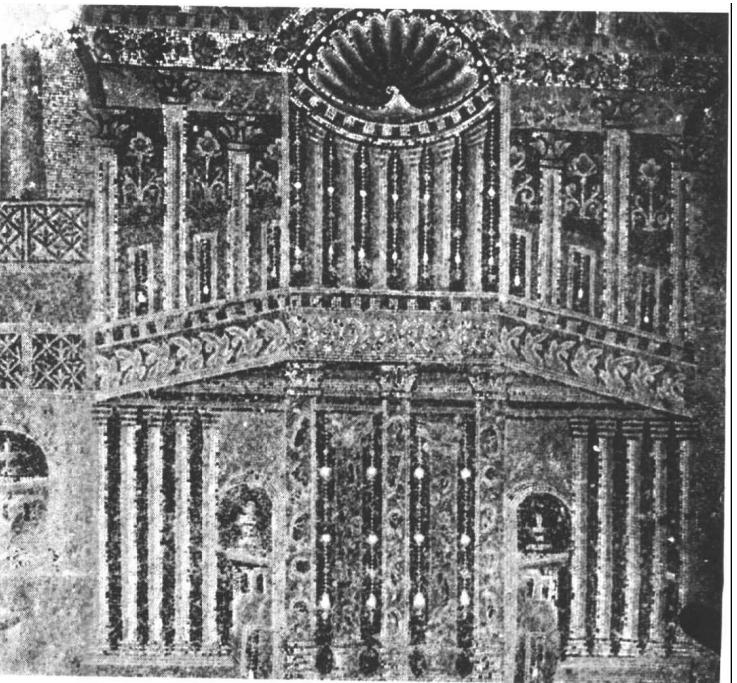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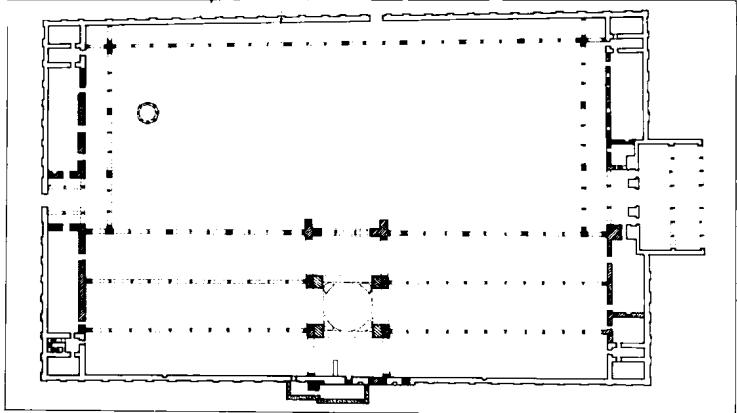
图 13 大马士革, 清真大寺, “萨罕”, 马赛克装饰细部

况, 现在可以理解为与阿格萨清真寺有关。最近由罗伯特·汉密尔顿 (Robert W. Hamilton) 所作的研究指出, 在现存穹顶正东面的拱券中至少有一个仍是韦立德时期的作品。若此说属实, 则它就是伊斯兰世界中第一座将拱券垂直于而不是平行于“齐伯拉”墙布置的清真寺。此举的用意肯定是要将“米海拉卜”柱廊调整到圣石庙的南入口方向上, 就像现存的清真寺一样。韦立德因此而强调了场地的神圣性, 其手段是将清真寺不仅与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的巴西利卡 (它与阿纳斯塔斯有着相似的关联)、而且与伯利恒 (Bethlehem) 的耶稣诞生教堂等同看待, 在这教堂中也有正对耶稣诞生处的相同的朝向处理。

韦立德的清真寺, 除了靠近“米海拉卜”的那一部分以外, 都在 747—748 年的地震中受到了严重损坏, 可能是在 758—759 年, 由阿拔斯哈里发曼苏尔 (al-Mansur) 主持重修。曼苏尔的继任者麦海迪 (al-Mahdi, 775—785 年) 几乎完全重建和扩展了阿格萨清真寺, 他在“米海拉卜”的上方增建了一个木构穹顶, 并将建筑向北延展了大约 59—65 英尺。这次扩建, 很可能是在他于 780 年访问耶路撒冷时完成的, 在宽得多的“米海拉卜”柱廊东西两面各设有七道柱廊, 它们均垂直于“齐伯拉”墙。这座建筑在 1033 年的地震中又差不多完全损毁, 并由埃及法帖梅哈里发扎希尔 (al-Zahir, 1021—1036 年) 于 1035 年重建。在现存的这座由扎希尔重建的清真寺中, 其“米海拉卜”柱廊东西两面的跨数很可能均不超过三个, 它们是寺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四、大马士革清真大寺

韦立德时期的大马士革清真大寺 (The Great Mosque of Damascus), 很快就成为当时在伊斯兰世界中最有影响的建筑并保存至今, 尽管它曾受到严重损毁并经过多次重建, 它仍然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主要的经典建筑之一。在对大马士革的征服期间 (635 年),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属于 1 世纪早期的大马士革朱庇特神庙 (Temple of Jupiter) 的内向的带有柱廊的圣区, 在神庙的原址或其附近, 将西奥多珊圣约翰教堂 (Theodosian Church of St. John) 围合起来。圣区的东半部分于是被改建成清真寺, 其“米海拉卜”, 当时不是壁龛, 如今被称作“圣门弟子” (Companions of the Prophet)。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当时都共同使用西入口。穆阿威叶于 664 年所建的清真寺, 肯定将被称为“圣门弟子”的“米海拉卜”围合起来了, 而他的宫殿——绿圆顶宫——就耸立在这一部分圣区围墙的南面。在 706 年后期, 韦立德从基督教徒手中夺取了圣约翰教堂, 将教堂以及除了圣区内四个角落的尖塔以外的所有东西全部摧毁, 并开始建造新的清真大寺, 完工于 714—715 年。



贯通东西的长长的围墙遏制了尖塔的内部凸出物，“萨罕”于是就被一道不受任何内部水平划分限制的两层连拱廊从四面加以围合。其底层拱廊由两根柱子和一座扶壁的交替重复构成，就像哈甲·索非亚(Hagia Sophia)的前院一样，君士坦丁堡的宫殿前院或许也是如此。其上层拱廊由在装饰性小圆柱上的双分拱券构成，大致是各自与下层的拱券相对应。礼拜殿用双坡屋顶划分成三道铺有地板的柱廊，它们均平行于旧圣区的南墙，即“齐伯拉”墙。这种布局很有可能是从将叙利亚的巴西利卡转换成清真寺的那种常见习惯演变而来：因为麦加在正南面，而穆斯林则不得不横过通常是朝东的建筑的柱廊来进行礼拜。尽管如此，认为现存的礼拜殿其实就是古老的圣约翰教堂的说法早已被抛弃了。

清真大寺礼拜殿最突出的特征是巨大的中央横厅(central transept)，在其中心部位的上方覆盖着木构双层壳穹顶。这个穹顶在1069年失火坍塌，由塞尔柱克苏丹马立克·沙阿(Malik Shah)用石构穹顶取而代之。但是他的这个穹顶也被毁坏了，现存的建筑是在1893年火灾之后对原有穹顶加以重修过的。横厅的北立面及其三重正门，堪与君士坦丁堡宫殿的乔尔基大门(Chalki Gate)相媲美。

虽然这座建筑的图纸资料没有保存下来，但其礼拜殿的立面与拉韦纳(Ravenna)的西奥多里克(Theodoric)宫殿的立面之间的明显相似性，正如在圣·阿波利纳耳·努沃(Apollinare Nuovo)的490—520年的马赛克装饰上所表现的那样，常常为人们所注意。哈里发于是又在这里增设了一个尖顶，就像在斯普利特的代俄克利喜安宫(Diocletian at Split, 285—300年)的尖顶一样，它也与带有穹顶的房间相通。

韦立德的清真大寺还有一点与西奥多里克宫殿相同，这就是其立面用马赛克加以装饰，而且，据说原来是用厚重的挂毯分隔萨罕的，就像在拉韦纳一样。这些相同的做法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似乎无可置疑的是，传统上与君主统治结合在一起的某些形式，在一种新的环境中为一个新世界的统治者重新效力。如果在其首都的清真大寺，就像当时的大马士革那样，在宗教和政治上都对伊斯兰世界有着重大意义的话，则这点当然不足为奇。

一道用等分的大理石一直镶嵌至拱券起拱点的护墙，将萨罕的其余三面完整地连接起来，而且礼拜殿的墙面很可能也是如此。这一切几乎全都消失于1069年、1401年以及1893年的大火之中。在萨罕的东、西廊殿后面，处于尖塔之间的狭长房间的采光，需借助于嵌在护墙上的圆形窗户。这些窗户都装有大理石格栅，其中有六扇保存至今，是在伊

斯兰建筑中运用几何交错图案的最早实例。克雷斯韦尔曾指出，其中有些图案的构成，运用了用等边三角形所组成的六边形，而另一些则运用了八边形的不同组合，这两种方式在希腊—罗马世界中都广为人知。

在大理石护墙的上边，墙体和拱券的内外两个表面都镶嵌着马赛克；克雷斯韦尔估计其面积大于1英亩。它们的美丽无与伦比，使得大马士革清真大寺享誉整个伊斯兰世界。这一庞大的装饰图案仅保存下来很少一部分，而且就是这些残存部分也曾经过多次修复，但从中似乎也可看出，非常写实的棕榈树、果树，以及耶路撒冷圣石庙的卷草(只是没有王冠和宝石)都在这里得以再现。在萨罕的周围，还残存着一些怪诞的檐壁碎片，碎片上所描绘的村庄、城市和宫殿，经常被安置在潺潺流水之上。《古兰经》的天国可能是其主题，但它是无人居住的天国。后来，从《古兰经》的“启示章”(Surah)里对于天国的描述中摘录下来的经文，取代了对于天国的视觉表现。

除了窗户以外，拱券的形状，并未沿用像圣石庙那样的半圆形，而是在轻巧的尖拱、高架拱或马蹄形拱之间变换。当前穆斯林时期的马蹄形拱的运用在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和西班牙已经相当普遍的时候，尖拱在6世纪的拜占庭还只是偶有使用。正如所有的伍麦叶时期的作品一样，清真大寺给人的印象是，拱券的形状尚未最后定型。

## 伍麦叶时期的世俗建筑

有一些宫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庄园主的住宅)、公共澡堂、商队客店(caravanserai or han)、以及至少两座经过规划的城市的遗迹资料已经公开发表了，因此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关伍麦叶时期世俗建筑真实情况的信息。关于与世隔绝的庄园主的住宅和澡堂，较早的和有些过分浪漫的解释，将其归因于伍麦叶贵族对于从游牧生活转换为定居的都市生活的无奈。这种观点的先决条件是，阿拉伯贵族向往着从如像大马士革这样的古老而拥挤的商业中心，甚至是像巴士拉和库法这样的新商业中心解脱出来，回归开敞而荒凉的沙漠地带，因为这些城市的人口都已迅速地增长。虽然我们不必对这种理论完全否定，但近来的研究表明，这些设施，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也是大多数，都处于或靠近拥有良好灌溉系统的农业区域，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并且绰绰有余。根据奥列格·格拉巴尔的最新发掘，至少有一个遗址，即叙利亚南部的海亚·谢尔基堡(Kasr al-Khayr al-Sharki)，很有可能曾被规划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军事驻防地，以便为附近的一个临时性的军营供应粮草。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仅能对几个典型建筑稍作讨论，但所有的资料在克雷斯韦尔关于早期穆斯林建筑的经典著作中都很容易找到。

## 一、安杰尔

尽管学术界的意见并不统一，但对安杰尔（Anjar）遗址〔在黎巴嫩的贝卡（Beqa）河谷，距巴勒贝克（Baalbek）不远〕是在韦立德一世统治时期兴建的这一说法，看来没有多少怀疑。在安杰尔附近有一个采石场，其石料专门用于墙体的外表面装饰，在这里所发现的一块碑铭上，提到了韦立德、遗址的名称以及 714—715 年这个年份；再者，从埃及派遣工匠的情况，在阿芙洛狄特纸莎草纸文稿中也有记载。安杰尔的布局值得注意的是它与罗马军营的布局很像，其带有连拱廊的南北走向的大道与通往其他部分的次要道路垂直相交于一座有十字形交叉通道的四通塔门（tetrapylon）并构成一个矩形的街区（insulae）方格网。然而，在其东南隅布置着典型的伍麦叶时期的、曾在明亚遗址（Khirbat Minyah）以及其他几处伍麦叶遗址中发现过“拜特”（bayt）的宫殿，坐落在布局相当不规范的清真寺的“齐伯拉”墙的正南面。宫殿里原来有两间半圆形的接见厅或“迈季利斯”（majlis）〔即一间“迪万·艾姆”和一间“迪万·哈斯”（diwan-i-khas）〕，其中至少有一间有两层楼高。在明亚遗址只有一间接见厅，可能也有两层楼高，而在海亚·盖尔比堡（Kasr al-Khayr al-Gharbi）和迈夫杰尔遗址（Khirbat al-Mafjar）则有一间或两间，其位置可能在现已消失的二层楼上。在安杰尔的西南隅有两座宅邸（背靠背布置的）都有方形庭院和“拜特”，每一座都与那些曾存在于海亚·谢尔基堡的更宽阔但也更标准的建筑很相像。在北门附近，有一座典型的公共澡堂，与在艾木赖的小宫（Qusayr Amra）中的澡堂十分相似。它拥有一间设有方形壁龛的三层觐见室，其楼板曾一度镶嵌有华丽的马赛克。在东北隅的角落上，正对着清真寺的另一座建筑，也有方形庭院和“拜特”，三面被成排的单层商店所围合，克雷斯韦尔相信，它很有可能是一座就像在海亚·谢尔基堡那样的地方长官公署而不是另一座宫殿。

在欠缺可资对照的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安杰尔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伍麦叶时期的产物，它所处区域正好在先前的罗马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以查士丁尼（Justinian）的赛尔希奥波利斯（Sergiopolis）时期的鲁萨费为其蓝本。它与在斯普利特的代俄克利喜安甚至与图拉真时代的萨穆加迪（提姆加德）有惊人的相似性。无论是斯普利特的较小的城垣或是萨穆加迪的更大些的城垣，其功能都非常明确，但在安杰尔却要稍逊一筹。在两条位于轴线上的街道上，其连拱廊一般是由一座扶壁连接着支撑在两根柱子上的三个拱券组合而成（就像在大马士革那样），似乎明显地有一些“苏齐”（suq）或市场，它们由一连串像罗马的临时房屋（tabernae）那样的摊位连接而成。根据在安杰尔的西南隅出土的

两座相当宽大的宅邸来判断，这一区域可能曾容纳了总共 24 座大小与之相近的宅邸。假设每座宅邸都有一个户主——其余三个角隅的空间要小一些——住在这里的人家不会超过 80 户，这对于哈里发来说，只是一支很小的随从而已。因此，安杰尔也许只是仅仅用于接待国事访问活动的手工艺人聚居地，或者是另一种军事后勤基地，就像海亚·谢尔基堡可能曾扮演过的角色一样，它甚至还有可能是为整个地区服务的高档货零售市场。

## 二、迈夫杰尔遗址

在韦立德一世之后的三个短暂而狂暴的政权，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几乎是灾难，包括第二次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失败。随着阿卜杜勒·马立克的第四个儿子希沙木（Hisham，724—743 年）的上台，帝国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收复了在河中府和马格里布所丢失的领土，并增加了税收。希沙木是一个伟大的建设者，在为数众多的建设项目中，除了一座宫殿和鲁萨费城墙外面的商队客店以外，他还建造了最钟爱的宅邸，即在海亚·盖尔比堡的另一座宫殿，以及在海亚·谢尔基堡的东部遗址。

迈夫杰尔遗址建筑群坐落在一大片农田之中，这里曾有经过精心设计的灌溉系统。所有的建筑都受到严重毁坏，可能是 747—748 年的地震所致。除了公共澡堂，当时没有一项工程完工，公共澡堂显示出曾被使用过的迹象。在其宫殿地基基坑的墙壁上的粗糙雕刻中提到了希沙木，但汉密尔顿在其 1959 年的著作中，相信它的恩主是希沙木那放荡的侄子韦立德·伊本·叶齐德（al-Walid ibn Yazid），叶齐德于 743 年 2 月以韦立德二世的名义上台执政，但在第二年的 4 月即被暗杀。克雷斯韦尔在他的《早期伊斯兰建筑》（1969 年）第二版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那项工程开工的时间不会迟于 739 年，确实是为希沙木建造的，只是因其去世而中断了而已。理查德·埃廷豪森（Richard Ettinghausen）在其关于公共澡堂的图解中值得注意的解释，则倾向于接受将其归属于韦立德二世的观点。无论二者谁是迈夫杰尔遗址的事实上的恩主，其装饰的重点都表达出相当强烈的君主统治的象征性。

浴室建筑群、清真寺和方形的“卡萨”（kasr）组合成一个整体——这或许是一种事后的想法——借助于一个大约 177 英尺×443 英尺的带有连拱廊的矩形庭院，其中的一部分很难说是在地震前开始建造的。在庭院的中央有一座带有喷泉的亭子，其布局的灵感来自曾用于圣石庙的同样主题。公共澡堂有一个精美的入口，它显然从罗马的凯旋门、或者是四通塔门汲取了养分。即使如此，其雉堞的形状、灰塑装饰的风格、壁龛的样式，以及附属雕塑的形象等等，都坚定地建立在萨珊王